



晚耕集

李庄

著

人民出版社

陈伯吹作序

人民日报社



李庄，中国当代新闻学专家。河北徐水人。1918年生。从事新闻工作五十五年。

他认为一生中憾事之一，是在长期编辑工作期间，用红笔多，用蓝笔少。历任《人民日报》编委、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著有《新世纪集》、《战斗十日》、《朝鲜战地目击记》、《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等。作者所写新闻报道及散体杂文，立意新颖，文笔轻松，语言精炼。本书是作者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之谈。

前 言

这本小册子收的文章，都是“文革”以后写的。

1978 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实事求是的前提是解放思想。这次全会严正地批判了禁锢人们多年的“左”的思想，批判了影响人们多年的个人崇拜，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长期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敢想敢说了。

解放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许多重要原则，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党认真总结了 20 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产生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标志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在抗日战争以来获得长足的发展。从 50 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渐感受极左思潮的干

扰。“文革”十年，新闻界能作的，几乎都是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所反对的。党的正面教育，极左思潮的反面教训，使得一代新闻工作者头脑逐渐清醒。坏事终于变成好事，迎来“文革”以后新闻工作的发展和新闻工作的改革。

我受个人崇拜严重影响，加上自己的某些弱点，头脑长期不清醒。经过“文革”的严重教训和党进行的拨乱反正的现实教育，逐步从极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开始想一些问题，写一些文章，谈坚持新闻工作优良传统，谈进行新闻改革的方方面面。文章大体分类后按时间排列，从中可以看出个人思想的发展和局限。

近20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和变化。与此同时，新中国建立以来所未见的某些消极现象也时有出现。前者指党的路线、方针和全国欣欣向荣的宏观情况，后者指某些社会生活的阴暗现象。邪风侵入，沉渣泛起，各种腐败行径有所滋长。群众气愤地说：“现在好的是真好，坏的是真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的问题在体制转变过程中一时难以避免，有的完全由于工作不力所造成。对此我在理智上比较清醒，在感情上万难接受。有些文章言词可能相当激烈，为了存真，并未改动。

我为一些同志的著作写的序言，占了这本书的相当部份。我不善作谀词，总是有个什么想法，同一本书谈及的问题碰对了，写篇短文，有的可以说是借题发挥。

也收进少量散文，有的是写革命岁月某个生活侧面，有的是写革命阵营曾经存在过的某种人际关系。这对青年同志了解革命经历过的某些事情，也许有点用处。

这本小书写作时间较晚，所以取名《晚耕集》。

李 庄

1997年5月

目 录

党报传统与新闻改革·····	(1)
继承发扬什么传统·····	(20)
学习和探索·····	(28)
发扬联系实际的传统·····	(33)
抓紧当前这个好时机·····	(39)
新闻记者更要学点辩证法·····	(44)
“倘是陈言 俱不选入” ·····	(47)
“一刻钟”和“五十元” ·····	(50)
编辑理应获得荣誉·····	(53)
我缺少什么·····	(57)
关键在于少而精·····	(62)
走出死胡同·····	(66)
也说写短文章·····	(70)
向青年编辑建议·····	(73)

对增加信息的一点看法·····	(76)
迟到的觉悟·····	(79)
我看正确舆论导向·····	(85)
我说“有偿新闻”·····	(87)

向《中国青年报》建个议·····	(90)
从禹作敏罪案说开去·····	(93)
饭桌上的议论·····	(98)
治盛世也“用重典”·····	(101)
公款吃喝与贪污无异·····	(105)
软，应该好好治一治·····	(108)
从一位老将军的困惑想到的·····	(110)
艰苦奋斗常讲常新·····	(114)
为《一嗟三叹话打假》续貂·····	(118)
呼唤八小时工作制·····	(122)

新闻记者就是要“挤”·····	(125)
独立思考是新闻记者的宝贵品质·····	(127)
“小报”不小·····	(129)
都来总结经验·····	(132)
精神文明建设是个大事·····	(134)
新闻界还少“个中三昧”·····	(137)
坎坷不一定全是坏事·····	(140)
我说“新闻有学”·····	(142)

坏人并非都不能写·····	(146)
序《首届韬奋新闻奖文集》·····	(149)
精神、法制双管齐下·····	(153)
在新闻改革中先走一步·····	(157)
女记者更应该受尊重·····	(161)
序《我当记者五十年》·····	(163)
记者贵在头脑清醒·····	(166)
心底无私 谆谆善诱·····	(168)
清漳河勾起的回忆·····	(174)
《任弼时同志二三事》写作之前·····	(180)
锋芒初试·····	(185)
想起救亡团体·····	(197)
人品和文品·····	(199)

党报传统与新闻改革

《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时，我到香港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事先曾将海外版试刊送给参加招待会的客人。美联社记者、《朝日新闻》记者对我说，《人民日报》出海外版，我们十分欢迎，我们一定要订。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不要因为出了海外版而停止《人民日报》在海外的发行。因为我们总是在《人民日报》上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主张，看你们国家的面貌和政治走向。你们的报纸登读者来信不少，按篇幅比例比我们登的要多，很能看出读者的意见，这是我们研究你们国家不可少的。他们指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报纸。我认为这两名记者无意中谈了我们党报的优势。当然，我们的优势用不着他们评价，更不必他们肯定。我只是说，为什么外国人能看出来的一些道理，我们有的同志反倒模糊了、甚至动摇了？比如说，党报的党性、指导性，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

革命的工具、革命的武器等观点，有些人是模糊的。个别同志写文章公然提出不同意这些看法。这样好，观点鲜明，便于讨论。我感到这些问题有澄清的必要。我愿意说说个人的意见。

我们党为什么要办党报？因为党报是干革命必不可少的武器。我们党成立不久，1922年就创办了《向导》周报，名副其实，做革命的向导，做人民的向导。我们党大规模地发展新闻事业，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当时在国民党的战时陪都重庆，在革命政权的首都延安，都办了党报；敌后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更是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当时八路军、新四军每到一地，首先是建党、建军、建政，同时创办党报。有个说法：“枪杆子，笔杆子，有这两杆子，中国革命就能胜利。”当时说的“笔杆子”，首先是指党报。以我长期工作的太行区来说，党是非常重视党报的，供应正确信息，提示宣传思想，选配干部，配备器材，组织警卫，等等，优先照顾报社，很有些同志说我们得天独厚。在党的领导下，在长期斗争中，党的新闻工作形成自己的优良传统。例如：坚持党性原则，把新闻工作看作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强调新闻必须真实，等等。这些传统有强大生命力，过去，现在，今后，都应该坚持和发扬。

有的同志强调新闻要公正，要客观，这当然是对的；认为坚持党报的党性，说党报是党的喉舌、人民的喉舌，

是革命的武器、革命的工具，就会损坏党报宣传报道的公正、客观，因此对这些名词很不喜欢，甚至反感，这就值得研究了。有的同志对我们常说的指导性，更加不能容忍。对此，我有不同看法。几个月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在《新闻战线》发表了。其中谈到指导性的问题，我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指导性是党报的灵魂。”指导性的核心是真实准确、有的放矢。……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抗战之初，我们党领导人民“打日本，救中国”，因此要创建根据地，要组织军队，制造枪炮，发展生产，创办报纸，等等。党报是党干革命的多种武器中的一种武器，运用通消息、发文章等形式，告诉群众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以打击敌人，保护人民，这就是指导性。指导性同党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谈指导性，党报也就失掉存在的价值。

指导也是服务。群众打日本，打蒋介石，减租减息，平分土地，发展生产供应军需民食，都需要党和政府思想、政策的领导。而党和政府所以能够领导群众，是因为正确地集中了群众的愿望、意见和智慧，无私地代表群众的利益，与群众心心相印、呼吸相通。党报宣传党的主张，传播新闻信息，交流经验教训，表扬先进典型，批评坏人坏事，是满足群众的要求，是为群众服务，也就是对群众进行指导。有的同志不了解根据地新闻工作的情况，以为当时强调指导性，大概就是反复在报纸上进行某种简单呆板的说教，而不管读者是否理解和喜欢。其实不然，

当时根据地对敌斗争严酷，读者的要求、兴趣相当专注，文化生活也比较贫乏。从上述情况出发，党报强调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尽可能办得通俗、明了、实用，满足读者的需要。以我长期工作的太行区为例：党报篇幅都比较少，华北《新华日报》、太行《新华日报》都是4开4版，铅印，晋冀鲁豫《人民日报》长期是对开2版，有时对开4版，铅印；理论文章不多，知识性文字甚少；3/4以上的篇幅是关于战争、生产、教育的新闻、通讯，主要通过事实的叙述报道，扬善抑恶，是是非非；文章多为群众欢迎的“豆腐块”，绝少长篇大论。现在看来，不少文字比较粗糙，缺少文采，甚至不够规范。但是朴素真实，开门见山，很少套话。

把指导性实际上看作贬义词，至少是一种误解。50年代末期以后的20年，新闻工作发生不少问题，并不是由于坚持指导性，恰恰相反，是违反了党报指导性的优良传统，表现为一不说真话，二文不对题。明明发生了“左”的路线错误，明明形势不那么好，偏要同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实际“拉开距离”，硬要人家相信路线正确，形势很好，能不令人反感、讨厌？不管读者想什么、要什么，成天板着面孔向人家重复千篇一律的套话，即使说的都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空泛“真理”，人家能不倒胃口？谢天谢地，那种艰难岁月是过去了。

将近30年前，我们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战争到和平，从革命割据到全国政权的巨大转变，适应当时的情

况，党报坚持指导性，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一些变革，应该说是及时的。但是，那次变革自然而不清醒，特别是没有来得及从新闻理论、办报思想上加以总结，以致 50 年代后期遇到一些非新闻界本身能够克服的困难，立即陷于手足无措的境地。在不同程度上，指导性丢掉了，报纸脱离群众了。

现在我们正经历一个从内外封闭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巨大转变，这对新闻工作的影响，比上次转变更为深刻。在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深入改革的大气候中，新闻工作也在积极、审慎地进行改革。几年来由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作为客观实际的反映，新闻工作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赋予新闻指导性更广泛的含义。刊登党和政府的方针、决定，发表言论传达党和政府的主张，是指导；以新闻、通讯说人论事，进行褒贬扬抑，是指导；传播知识、介绍娱乐、刊登广告，等等，要选择、鉴别，有取舍、轻重，也是指导，或者叫引导。这样看符合新闻工作不断发展的实际，也有利于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当然，报刊、广播、电视中多数文字，都是记者——作者个人的观察和判断，但只要它们正确反映社会现实，符合党的路线和国家的宪法，对读者都有帮助，都有指导作用。写新闻作品，我们长期提倡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是很对的，应当坚持；在受众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日益提高的今天，同时强调提高宣传艺术，寓指导性于生动、引人

的新闻报道之中，它的效果会更大更好。

新闻单位工作比较紧张，常常匆匆忙忙，我们可以集中足够的力量探索别的事物，常常忽略集中必要的力量解剖我们自己。这是新闻工作提高不够快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我们丧失了一个重要时机。对党报、对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当时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结束，转入和平建设；解放区的革命割据转为全国政权，我们党成为国家执政党；在革命战争期间，斗争紧张、残酷，大家团结对敌，人民内部矛盾表现不很明显，解放以后日益显露；过去大家忙于战争，军民、政民一样过简朴生活，个人要求很少，解放以后多起来了。在新形势下，党报的本质属性、根本任务没有变，但宣传思想、报道内容，以及格调、文风等等，应该有所改变。以《人民日报》来说，原来是华北地区的报纸、华北中央局的机关报。1949年8月改成中央机关报，基本上还是原来的人员。以后撤销大区，各中央局的机关报有的撤销，有的转为省报。各中央局党报的许多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调到人民日报社。6个大区，五湖四海，人手充盈，经验汇集，完全有条件结合日常工作，冷静地、客观地把新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待解决的新问题议一议、理一理，把应兴应革的事项定出几条，在新闻同业中带个头。可惜当时没有这么做。虽然在实践中做了一些变革，例如增加知识性的东西，也增加些正当娱乐性的东西，新闻、消息比以前多了、快了，报纸版面也有改进。但是这些变革不系统，人

们头脑也不清醒，而且多是在新闻业务方面，至于新闻体制、新闻工作指导方针等重大问题，基本没有涉及。以后国家发生暂时经济困难，新闻工作走到一些不尽合理的条条框框之中。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曾是一个好机会。改版后的几个月有相当明显的变化，现在翻翻当时的报纸，还可以看出新鲜活泼的生气。那次虽然没有涉及新闻体制，但宣传方针、业务思想方面的变化是不小的。当时中央肯定《人民日报》的改版，批转了《人民日报》的改版报告，提出“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的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我们党的各种报纸……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现在《人民日报》和各兄弟报纸在进行改革，但是从思路、目标和进程来看，好像还不能说达到1956年改版时的水平。1957年反右开始，改革就中断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新闻界很积极，是有贡献的。对各条战线的问题做了不少探索。但又再现了刚解放时候的情况：忙于日常报道工作，对自身的问题却没有来得及进行研究。从革命战争到50年代中期，政治形势好，新闻工作生龙活虎，积累许多新经验；以后受极左路线影响，接着“文革”十年，形势不好，新闻工作难做，教训颇多。如能对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总结，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扬弃不适合当前情

况的观点和做法，提炼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鲜经验，该多么好啊！《人民日报》曾经组织几位同志，草拟几篇文章，只发了一篇，又失掉一次机会。正因为当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分清是非，加上外来新闻学说的某些消极影响，就出现了一些不能说是很强烈的，甚至不一定是很自觉的否定党报优良传统的意见。现在进行新闻改革，正是溯本穷源，继往开来的好机会，再也不能放过了。

我们国家各个方面都在进行改革，新闻工作的许多旧框框、旧做法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央是支持新闻改革的，提出积极、稳妥的方针，已经采取若干对应的措施；群众热情要求新闻改革；新闻界的同志更是大声疾呼，希望加快新闻改革步伐。党报面临着多种新闻传播工具的竞争和挑战，党报工作人员反映大报不如小报好办，不少读者说大报不如某些小报受欢迎。这种欢迎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是可以研究的。但无论如何，党报应该站在新闻改革的前面。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促进的作用，它又受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有一种说法，新闻改革应该“超前”，或者说，新闻改革最好“一步到位”。考虑各种现实条件，我看不大可能做到，而且不一定完全合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究竟是什么样子，正在探索、实践当中，不能像赛足球，临门一脚踢进去。我甚至感到，与其走得很快、走得不稳而被迫休整，不如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积极、稳妥的方针是正确的。

新闻改革不只是新闻机关的事，要全社会关注和参与，要党委大力支持。可不可以这么讲，许多机关、企业都在“简政放权”，进行新闻改革，从领导与新闻单位的关系来说，同样适用这4个字：“简政放权”。党委对党报要加强领导，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应该改善领导，也是不能忽视的。党委领导新闻单位，主要是“给思想”，即指示宣传思想，帮助党报工作人员深入了解党的方针和意图，了解宣传报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同时加重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加重总编辑的责任。一方面“给思想”，一方面加担子，由总编辑对宣传报道负全责。错了，批评、纠正，总结经验教训；由报社向读者道歉、更正。事实证明，报社越是有权、有责，越是积极、谨慎。50年代后期，有些规定非常死，把报纸工作人员的手脚捆住了，使后者对上面交发的东西，即使看出问题也不敢提出，甚至发现错字也不改动。从我们自己讲，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也说明，报纸工作人员，首先是总编辑，他应该有的权力、责任感越小，积极性越难发挥出来。七届人大、七届政协的宣传，大家是称道的，中央也是肯定的。当时我已退居二线，我理解所以搞得好的，就是由于给“两会”的宣传规定了明确的方针、界限、纪律，至于具体怎么做，放手让各新闻单位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结果很好，群众满意，领导肯定，创造了一些新经验。

新闻改革，就党报工作人员来讲，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中央的方针，积极、稳妥地进行。1988年8